

东亚同文书院 1927-1943 中国调查资料概述*

郭传芹

内容摘要:东亚同文书院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在中国开展大规模旅行调查,调查成果数以千计,涉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为日本政府和军部提供了重要情报,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这些调查资料主要包括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旅行日志是参与调查的学生沿途所见所闻的记载,调查报告则是对某一地区或专题所做的专门调研。他们通过铁路或水路,以实地踏查的旅行方式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搜集了关乎中国国情的一手调查资料。目前国内所藏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档案,是书院撤退时遗留下来的,这些调查资料相当珍贵,反映了书院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的行为,其调查内容和特点值得深入研究,这些调查也对研究战时日本在中国实施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东亚同文书院 中日关系 调查报告

东亚同文书院(以下简称“书院”)是近代日本在中国国力较弱时于上海建立专门招收日本学生的学校,自1900年创建至1945年日本战败撤校。其目标是培养了解中国国情的学生,一些学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为日军服务。每届学生毕业前在学校统一安排下,利用暑假到中国各地实地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作为毕业论文,这些旅行成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该校在二战后被盟军认定为间谍学校^①。

目前,国内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专著和论文,但关于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的专门研究与其丰富的资料相比,显得比较薄弱,目前可见的有冯天瑜等选编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杨华等译《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国家图书馆整理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二战后日本战犯审判新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BXW069)的成果之一。

①(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丛刊》。这些资料对我们认识了解大旅行具有重要价值。房建昌曾发表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档案的发现及价值》^①一文,对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进行了介绍,并对其史料价值予以充分肯定,重点介绍了1938-1943年的调查资料,但缺乏对调查资料整体情况的介绍,对调查路线、方法以及特点更少论及。高娟《他者視野からみる東亜同文書院の内モンゴル》(調査旅行)一文主要研究了东亚同文书院的内蒙古调查活动。书院学生的大旅行日志和调查,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值得我们深入细致研究。与此相比,日本学者对大旅行的研究较为充分,如藤田佳久《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大调查旅行の研究》、《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旅行记录》系列著作,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等,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具有鲜明的个人情感色彩,回避了调查报告服务于日本侵华的特殊历史背景。近两年来,笔者有幸接触这批调查资料并从事整理工作,因而得以窥见大旅行资料的原始面貌,并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本文着重从整体上介绍学生大旅行调查收藏情况,并对旅行线路、调查方法及调查内容和特点进行分析概括,并从中日关系角度分析其价值和意义。

一、文献收藏与出版情况概述^②

鉴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重点介绍学生完成的旅行成果(包括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国图所藏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和日志是独立存放、集中保存的,绝大多数都有统一装订,只有1943年的调查旅行成果未做装订。这些调查档案都是书院学生的稿本或者复写本,其中1943年以稿本为主,其他旅行年份也间或有稿本,余者多为复写本。撰写所用纸张都有统一格式,因而容易区分。每期学生旅行结束都会将调查旅行成果做成5份抄本,“分别提交给参谋本部、外务省、农商务省,在东亚同文会、同文书院也各保存1份”^③。国图所藏调查报告和日志从来源上看有两种区分:一是1939年及之前的大旅行调查,这些文献在正文开始处右上方都钤有“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图书馆印”,表明这批文献是当时同文书院保存的副本。二是1939年之后的大旅行调查,文献上没有任何收藏标记,因而不确定是哪一种副本,且后期稿本较多,复本情况也较为普遍,这部分是国图的独有馆藏,日本爱知大学也缺藏的。1939年底同文书院升格为大学,这一点从调查报告用纸也可见,之前纸张的左侧下方标有“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报告用纸”,之后则标有“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学生调查大旅行指导室”,突出“大旅行指导室”,名称的变化也反映了书院对大旅行的重视及对大旅行所发挥的作用。

①房建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档案的发现及价值》,《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5期。

②关于国家图书馆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资料的收藏历史,可参见《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年第27期发表的苏维《东亚同文书院藏书考述》一文。

③(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资料,目前以日本爱知大学收藏较为全面,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以1927年至1943年的为主,1936年缺藏,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旅行不可能进行下去”^①,只见几册研究旅行日志。这些调查成果分别以报告和旅行日志的形式呈现,总量约1700种,其中调查报告800余种。对于这种大规模调查及其成果,东亚同文会作为书院的主管机关曾有计划地进行出版。《支那经济全书》(1909年)、《支那省别全志(18卷)》(1920年)等调查资料的出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1940年同文会决定整理出版《新修支那省别全志》,原计划出版22卷,实际上因日本战败只出到第8卷,从1941年至1944年陆续出版。这8卷分别是四川(1-2卷),云南(3卷),贵州(4-5卷),陕西(6卷),甘肃、宁夏(7卷),新疆(8卷)。同时东亚同文会从1940年开始,将上一年度的调查报告选择性出版,共出三卷,分别是《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14、15、16年度)。这些铅字版的调查报告与原稿有明显区别:首先是内容的选择上,为了规范体例,对有些内容予以舍弃,而原稿保留了很多原始信息,如昭和十五年度长江流域调查第八班中村文雄的调查报告《支那事变と漢口の物資》,在收入《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15年度)一书时,除了目次有所变动外,还删除了手稿中的“右の表は漢口宣撫用物資配給組合の調査に依るものである”这句话,该句话的右边标注了“秘”字;其次是用于出版的调查报告是经过严格选择的,经笔者比较,后期出版的《东亚调查报告书》收入的数量实际上只有当时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于学生写的旅行日记,东亚同文会每年会把它们汇集为一本旅行志出版发行,共有34卷,国图藏有28卷,爱知大学曾在2006年将整套旅行志重新影印出版。这些已出版的成果,与原稿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比如旅行日志,原稿基本上逐日记载,或简或详,没有主题,每个人都撰写日记,也有个别合记现象,但收入出版的旅行志时则会按照一定体例,以班为单位,都设有主题,且内有小标题,内容表述方面也有差别。原稿则保留了更多一手信息,包括作者的修改痕迹,初始思路,旅行杂感等内容。因此,这些旅行成果的稿本或复写本具有更大的资料和研究价值。

二、旅行线路与调查方法

大旅行调查是书院最重视的课程,“目的在于调查中国实情,作成报告,供日本政府作为对华政策之参考”^②。到20世纪20年代已经发展成熟,旅行线路、调查方法以及撰写体例等都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每届学生少则50人左右,多则100余人,由即将毕业的学生实施大旅行计划,他们提交旅行调查报告作为毕业论文。旅行时分成几人的小班,一般是3-5人。从他们的日记可以看

①(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②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第37页。

出,出发时都会有隆重的仪式,每个人都要完成不同的调查任务。旅行线路都是由书院设定,学生会在旅行日志中记载所过之地,有些会绘制旅行线路图,线路会有重叠,但调查主题往往各异。旅行一般通过水路和铁路两种方式实现,不少调查都是围绕交通沿线的经济、地理、文化、民情等展开,足迹踏遍中国各地。班次命名也与线路密切相关。受篇幅所限,兹列举旅行范围较广、极具代表性的第27期生旅行线路,制表如下^①:

年代	班次	经过地	成员
1930 年 (第 27期 生)	扬子江流域经济调查班	上海-崇明-南通-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武昌-汉阳-长沙-岳州-沙市-宜昌-万县-重庆-宜昌-汉口-大治-上海	宇敷正章、竹冈彦次郎、水江满、下川贤、镰田龙男
	巴蜀岷涪经济调查班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合川-潼南-遂宁-简阳-成都-嘉定-峨眉-成都-灌县-汶川-茂县-松潘-平武-江油-中坝-绵阳-三台-遂宁-合川-重庆-上海	兼松胜、中滨三郎、友添健策、叶山生
	四川陕西经济调查班	上海-南京-汉口-宜昌-万县-重庆-自流井-资阳-成都-绵阳-剑阁-宁差-汉中-宁陕-西安-潼关-运城-榆次-石家庄-北京	深本春夫、长谷川武雄、中村太郎、岛津真三郎、铃木修司
	正太沿线山西北部调查班	上海-青岛-天津-北京-正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归化城-包头镇-大同-张家口-北京-天津-大连	数村吉之助、后藤隆三、村田季雄
	河南山西棉业调查班	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石家庄-太原-临汾-运城-介休-榆次-太原-大同-张家口-天津	中岛弘、楠木一夫、泽登誉、北村重英、森田膝治
	粤汉铁路沿线经济调查班	上海-汉口-长沙-上海-厦门-汕头-香港-广东-韶州	安齐库治、加藤荣太郎、坂口久、田村三郎、柿田琢磨、山中秀宣
	南支港势调查班	上海-福州-厦门-汕头-香港-广东-澳门-香港-海口-北海-海防-河内-香港-上海	池江善治、市川信治、桑岛泰雄、青山清
	南支沿岸佛领印度支那调查班	上海-福州-基隆-高雄-台南-台中-嘉义-淡水-基隆-厦门-汕头-香港-海防-河内-南定-绞-顺化-シンガポール	德冈照、金田一郎、元木数雄、峰谷贞雄、小林鈔

①此表主要依据1931年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编辑出版的大旅行志《东南西北》相关旅行线路制作而成。

(续表)

年代	班次	经过地	成员
	西桂湘流域调查班	上海-厦门-汕头-香港-广东-三水-梧州-海口-北海-海防-河内-昆明-海防-香港-上海	长谷川信吉、保科尚卫、辻桥祐吉、成田英一、熊谷林之助、山崎长五郎
	平津驻在班	上海-青岛-天津-北平	永安文三、吉冈四郎、山下一、岩尾正利、长田阳一、久重四郎、陈济昌、大平孝
	胶济驻在经济调查班	上海-青岛-济南-天津-北平	村上重义、伴重雄、管一弘、高桥宏、中崎强、天野治邦、伏屋幹男、町野大辅
	北支港势调查班	上海-青岛-大连-营口-秦皇岛-天津-北京-青龙桥-北京-天津-大连	贵堂贞三、牛岛俊作、笼谷文雄、川濑清、渡边修三
	东蒙古经济调查班	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唐山-平泉-赤峰-开鲁-白音太来-郑家屯-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奉天-抚顺-大连	桥本义雄、今泉正民、加藤隆德、田添正嗣、根岸孝彦、古藪盛三、江下清一
	京奉沿线调查班	上海-天津-北京-滦县-秦皇岛-山海关-锦州-奉天-大连-上海	吉田九郎、鹤饲藤一郎、神谷清助、小西勇
	哈市驻在班	上海-青岛-大连-奉天-长春-哈尔滨-奉天	冈村贞一、大屋保义、村井美喜雄
	四洮洮昂沿线经济调查班	上海-青岛-大连-奉天-四平街-郑家屯-洮南-昂昂溪-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奉天	渊边元广、竹田巳则、村山达太郎、浦敏郎
	满蒙经济调查班	上海-青岛-天津-北平-葫芦岛-打虎山-新立屯-白音太拉-郑家屯-洮南-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上海	前田进、真柄富治、田中守造、芝国重、中马靖友
	吉会沿线调查班	上海-青岛-大连-奉天-抚顺-长春-哈尔滨-长春-吉林-敦化-老头沟-龙井村-延吉-上三峰-会宁	池田静夫、神棒真幸、梅田洁、福山寿、左近允武夫

通过上表可以发现当时的旅行线路遍布各地,南至南洋各国,包括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等,北至黑龙江,东至沿海各省,西及四川陕西等地。随着日本侵华野心逐渐暴露,1932年国民政府停止发给旅行护照,此后的大旅行受到了限制,基本上局限于日占区和日伪统治区域。根据1934年出版的旅行志《亜細

垂の礎》记载,1933年实际上只对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各县进行调查,旅行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全面抗战爆发后,书院加强了对日本占领区的调查。学生在旅行途中所做的日记对沿途风光、民情风俗、城市观感、地理信息等都有记录,保留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对于民俗学、地方史研究都具有史料价值。

书院学生的大旅行采取的是实地踏查为主的实证方法,早期他们还扮成中国人,与中国民众进行交流,了解中国的风俗人情;中后期仍然采取实地调查形式,但调查方法有所改变,如书院先将调查事项制成表格发到县公署,由县公署协助提供资料^①。调查报告的撰写还充分利用中国当地政府部门资料以及日本人已有的调查资料,例如1929年第二十六期生南支港湾调查班对汕头、厦门、广州的调查^②,就使用了1928年发行的汕头市长黄开山著《新汕头》、昭和二年(1927年)发行的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著《新汕头》等资料,对广州市政的调查使用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广州市政公报;厦门调查则使用了日本领事馆发行的《厦门状况》等资料;有些专题调查则充分利用满铁调查资料,如第二十九期生城台正撰写的《最近に于ける露支陆路贸易事情》,对中俄陆路贸易的调查就大量使用了满铁调查资料,并制作了详细的贸易记录表。有时,他们也会对自己的调查方法感到忧虑,例如山本尚长在《岳阳城人口调查报告》中记录了他所采用的人口调查方法,其中提到所使用统计资料的局限。尽管如此,就当时的调查方法来说,其精密性、系统性,“则非处于半殖民地状态的清政府、民国政府的国情调查工作所能比拟”^③。实际上,日本人通过这样一种实地调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掌握了大量有关中国国情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三、旅行调查内容与特点

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调查是有组织有系统的,调查内容也相当广泛。纵观1927年至1943年的调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27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第二阶段1932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三阶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第一阶段的调查,虽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但每年的旅行调查,书院还可以取得中国政府的许可,因此旅行的范围没有受限。调查的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司法、政治、经济、工业、教育、交通、税制(包括盐税、厘金)、矿藏、林业、

① 腾田一夫,城繁雄,吉田藤一:《吉林省桦川县调查报告书》,复写本,1933年,作者在凡例中记载了这一调查方法。

② 杉原信一:《南支沿岸都市调查》,复写本,东亚同文书院调查报告1929年,作者在序言中记录了调查所使用的方法及参考资料。

③ 冯天瑜,刘柏林,李少军选编,李少军等译:《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导言”第8页。

农业(包括水田、家畜、蚕丝业)、金融、贸易、铁道沿线、商业团体、华侨、农民、劳工、物产、海港、鸦片、药材、牧畜业、地理、羊毛、猪毛、棉花等。调查内容详细,如对济南、天津牛皮牛骨的调查^①,其中对牛皮的种类、用途、品质、集散状况、买付方法、制革业,牛骨的产地、用途、种类、品质鉴定等都有明确记载。对矿藏的调查占有相当的比例,有些数据来源于日本人开设的矿藏公司。如对山东煤炭的调查^②,首先叙述了山东地质概况、炭田分布、成因等,对一些具体煤矿都有详细记载如白谷囤、甜水沟、金盆地、花雨沟、宋家场等,同时对煤炭质与量进行了分析,保留了很多数据,是日本获取中国矿藏资源情报的重要途径。对鸦片的调查《北满に于ける阿片》《满洲に于ける阿片禁止ニ关する问题》《云南省に于ける阿片药材调查》等,涉及云南、东三省、内蒙古、津浦沿线鸦片种植情况、鸦片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阐述、禁烟运动等。在金融方面,除银行外,对中国传统的金融形态如各地的钱庄、当铺、银号等都有专题调查,如《天津ニ於ケル钱庄》《张家口事情》等。可以说通过调查对当时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及人民的金融观念都有深入的了解。在农业调查方面,如《满洲ニ于ケル水田》,对耕地、人口密度、地价、耕作现状、农民生活状态、土地利用、气象条件、海拔高度、土壤保水力、肥力、水分、农业经济组织等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他们也关注华侨的动态,有专门调查,如《兰领东印度及马来半岛の华侨》《南洋华侨の现状》等,对华侨觉醒运动、教育问题、职业种类、分布状况、华侨出身地、经济状态、排日等问题进行调查,同时在调查报告中还附有人口和移民统计表。对中俄关系的调查,包括1924年中俄协议的专门调查。对港口的调查也做的很精细,包括海水温度、海底深度、埠头、水陆运输与周边港口的关系。这些调查详尽而周密,每年的报告都报给外务省和陆军省^③,为其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情报。

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进攻国民党驻上海十九路军,中日关系持续恶化。这一年国民政府停止给东亚同文书院发放大旅行护照,此后的大旅行调查主要集中于日本控制的区域内,侧重于东三省。根据调查报告统计,这个时期大多数是对东北各县的调查,报告体例较为统一,分别对各县的地势、物产、交通、商业、金融、社会、人口、家族、教育、人情风俗等展开调查,一般还绘有各县的形势略图。除东北外,还对东亚同文书院所在地的上海、南洋及日据下的台湾等地展开调查。上海的调查主要是对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研究,如《上海を中心とする支那财閥の研究》,对上海金融机关、主要企业财阀、钱庄业、银行业、各财阀势力分布、金融支配体制等进行调查;对上海的制粉业、钱庄也进行了专门调查。在台湾主要调查了日本殖民政策对台湾

①参见原口辉雄:《济南及天津に于ける牛皮及牛骨》,复写本,1927年。

②坪根一雄:《山东省に于ける石炭调查》,复写本,1927年。

③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昭和十四年度》1940年,在大内畅三所做的序文中提到,报告书每年给外务省和陆军省。

经济、文化及民族运动的影响,如《日本植民政策の台湾に及ぼせし影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事全面爆发,出于安全考虑,刚刚开始旅行的第34期学生,“学院强制学生回校”^①。随着战事的发展,学生临时回国避难,1938年又回到上海,因此1937年的旅行调查成果比较少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书院的大旅行调查仍然在继续。这个时期的调查在内容上与前期相比,具有一些显著特点。一是调查战争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即对调查对象在卢沟桥事变前后情况进行比较,如《事变後に于ける安庆都市事情》《事变後の武汉三鎮を中心とした一般地理概況》《事变前後に于ける山东紡績業に就いて》《蒙疆の戦後復興状況》等等,调查战争对当地工业、人口、教育、交通、城市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及战后恢复情况。二是配合日本侵略战争需要进行目的明确的调查,如对粮食配给、搜荷制度的调查并提出对策,对经济统制的调查等。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持续和扩大,日本对粮食及相关物资的需求日益紧迫,1939年开始在日伪统治区推行粮食出荷制度,以极低的价格对农产品实行统制和掠夺。在此背景下,同文书院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如《汉口を中心とする棉花搜荷制度——农村生産物搜荷制度,汉口棉花产量统计》《南通搜荷配给》《崇明岛搜荷调查报告书》《杭州附近を中心とする棉花の搜荷制度及一般棉花状況》《无锡地区に于ける搜荷及び配給の現況》《华北棉の増産と搜荷対策》等。对“协和会”“合作社”等组织的调查,如《汉口地方の物資交流と合作社に就いて》。此篇为秘密调查,禁止发表。书院开展这些针对性较强的调查,对日本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三是调查重点突出,加强了对人口、方言、清乡运动、治安、新民会、亲日教育、财政、民船等专门调查,这些都是针对战争中及战后日本人对占领区统治需要而进行的调查。四是特殊秘密调查,随着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全面推进,东亚同文书院也利用旅行调查优势和便利,进行了某些秘密调查。除了开展受其他机构委托的秘密调查外,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报告中,还发现了其他一些涉密调查,标有“极秘”“秘”“发表禁止”等标识。如1940年的调查报告《北支に于ける自動車交通に就いて》,报告扉页上有“注意”事项,说明报告中涉及的数字是秘级的,尤其强调调自动车(即汽车)的路线表和车辆数是“极秘”。这篇报告主要调查了自动车道路的沿革、建设计划、华北交通自动车部道路对策、事变前后自动车概况、货物自动车运送等,并附有1938-1939年道路建设施工路线表。又一篇《北支那经济开发と日支合作問題に就て》,其中附有“山西地区军管理工場营业状态调表”(“调表”为原文记载,即调查表),也标有“秘”字。1941年的调查报告《汉口地方の物資交流と合作社に就いて》在书名页用红笔标注“外部发表严禁”。这些涉及秘密的调查充分表明了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身份。此外,还对所谓的“大东亚战争”“兴亚政策”影响进行调查,对日本的开拓团、居留民团、

①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农业移民、外国人在中国利益、中国人对日本态度等也有调查,他们还时刻关注华侨的政治动向。

关于旅行日志,学生进行旅行调查时,书院要求他们同时撰写旅行日记并和调查报告一起提交。这些日记虽不是正式的调查资料,但通过这些日记我们可以了解书院学生深入中国社会调查的方法,他们的实地感受和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他们笔下所记录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状态,比如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土匪猖獗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学生从军见闻等。有些日记甚为详细,比如在对云南调查时,对苗族人衣着装扮采取画图的形式直观表现^①。对地理的描述也很细微,比如对哈尔滨地理位置的描述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尽管是20世纪20年代的描述,但自然风貌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至今读来依然印象深刻。这些旅行日记有助于我们从感性的角度更多地认识当时中国社会,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调查背景和调查内容。

四、东亚同文书院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密切关系

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跻身强国之列,为了最终占有中国,民间组织与官方活动齐头并进,这些所谓的民间组织又与官方保持着密切联系。东亚同文书院由东亚同文会发起创办。同文会是日本政府授意和资助成立的半官方性质的政治团体,隶属外务省,其常年经费由山县内阁决定从1899年起提供4万日元。该会成立后,除在中、朝各地办学办报外,还把收集情报作为一个重要任务^②。其会员多是当时日本各界重要人物,如近卫笃磨、田锅安之助、荒尾精、犬养毅等。同文书院就是该会创办影响最大的书院,通过开展教育的方式,对中国进行长期调查,收集情报。书院一些重大活动日本官方或军部都会派代表参加,这与西方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有着明显的差异。

大旅行调查作为书院最有特色的教学方式在日本国内也产生了强烈反响,尤其在青年人中影响很大,他们都把能够到中国学习并做旅行调查作为荣耀。早期最有名的调查当属1905年7月,书院应外务省的要求,派遣第2期学生林出贤次郎等五人,远赴中国西北新疆地区,对俄国势力的渗透情况进行了长达二年的“带有国策性重大使命”的调查旅行。由于林出等人提交的情报详细而有价值,因此除获得奖励外,还被外务省录用为官员^③,活跃在日本外交界。正是由于这种带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调查活动,书院“在相当程度上被纳入了日本的对华决策,乃至扩张、侵略之需要”^④。全面抗战时期,书院的旅行调查则“应时局之需要,以长江流域和海南岛为主要范围,分别编成了占领地区

①德山春宣:《调查日记》复写本,第24期生云南班,1928年,第10页。

②霞山会编:《东亚同文会史》,东京霞山会,2003年,第34页。

③大学史编纂委员会编:《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东京沪友会,1982年,第186页。

④单冠初:《试论东亚同文书院的政治特点——兼与西方在华教会大学比较》,《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

工商业、在华日人居住状况、教育复兴状况、外国人权益状况、日人在华发展状况和新政权的经济统制等各个调查班”^①。书院的这种官方背景注定了它在日本对华政策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尤其是它的调查资料为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数据支撑。书院在成立初期非常注重与中国朝野关系的处理,它以发展教育这种隐蔽的方式开展中国国情调查,并未引起中国政府和国人对其调查真实意图的重视,因此在其前20多年的历史中发展迅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以及阴谋占领中国野心的凸显,中国政府和人民认清了书院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实质,拒绝其开展调查,停止发给旅行护照。负责制定旅行计划的小竹文夫曾写道“如果完全听国民政府的话,几乎没地方可去”^②。从1927—1943年大旅行调查的路线、区域范围可以明确地看出差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书院的旅行调查主要围绕战争需要而开展,考察日本对占领地区推行的各项政策及其效果,调查敌伪区国民的思想动向,特别是一些密级的调查,完全为军方服务。这种战争期间严密的调查,反映了战时普遍存在于日本人思想中的扩张意识。因此这些资料对研究日本对华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报告和旅行日志虽是学生个人独立撰写完成,但它们属于书院和政府,由其直接领导机关东亚同文会组织出版,影响很大。这些调查在日本社会打开了一面深入认识中国的窗口,中国多样的生态、丰富的物产、富含矿藏的土地、民情风俗等无不使日本人为之神往。他们也急于踏上这片土地,实行他们所谓的“经营大陆”策略。这也是书院学生每次大旅行时激情高昂的重要原因。东亚同文书院一直强调开展大旅行调查是为了促进中日贸易,突出经济和文化意义,以此为遮掩,实际上他们获取了大量经济文化情报。书院学生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早在日俄战争时期,第一期毕业学生“恰逢日俄之战,毕业生中有很多从军者”^③。中日战争期间也有很多学生参军担任翻译,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这些调查资料,一方面为日本政府和军部利用,在其对华政策制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为我们今天研究日本在占领区推行的政策、日伪统治、对战争资源的统制和掠夺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些卷帙浩繁的调查资料也同时反映了调查者本身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及民族性等信息,通过系统搜集和整理,有助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深入开展。客观上,这些调查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还原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一般面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郭传芹,女,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新闻史。

①大学史编纂委员会编:《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东京沪友会,1982年,第159页。

②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③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90页。